笨手指

张 芸

父亲的亲舅舅,也就是我的舅爷爷,他曾有一根奇特的食指——粗且明显错位,在当地被称作“笨手指”。为什么叫这么个古怪名字?原来这里面是有故事的。

舅爷是山东农村人,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。在村子里,他家是属于比较富裕的,农村人本来就重男轻女,再加上他是这个大家庭中的长房长孙,所以从小就很受宠,接受教育也早。私塾先生来家里为孩子们授课,表姐妹、堂兄弟十几个孩子,不分年龄一起听课,舅爷年龄最小,总是边学边玩,还常搞出一些小动作影响先生授课,弄得先生总是找他爷爷告状。但是他爷爷总是护着说“顽皮乃孩子天性”,从不加责罚。舅爷也是争气,别看年龄小,每次考试,没有他不会的,还总是得满分。有一次,他考得不好,但其他兄弟姐妹有人得了满分,他生自己气了,见谁都不搭理,一个人待在屋子里。晚上吃饭时,任谁去叫他也不出来,点上煤油灯不停地抄写,写了一遍又一遍,直到整个院子都黑了灯,他屋里还是明晃晃的。也是自那之后,他知道努力了,晚睡早起地念起书来,无论是先生检查作业,还是背诵默写,他在这群孩子中都是第一才行。他说,他要对得起爷爷的偏爱。

舅爷从小淘气好动,对不需要干的农活儿他也要学。放假在家他从不闲着,跟着大人们下地摘棉花、掰玉米、刨红薯……还经常叫上一起上学的堂兄弟,下地帮着家人干农活儿,婶婶们都很喜欢他,说他从小就有号召力和影响力。

冬天是农村一年之中最闲的时候,称之为农闲时刻,也是最寒冷的季节。白天只要出太阳,老人们最喜欢做的就是靠在墙根,嘴里叼着大烟袋,三一群、五一伙儿地凑在一起,一边晒太阳,一边唠家常。冬季暖阳的日子,临街墙根晒太阳的老人,从村东头一直蹲到村西头,连比画、带说笑地好不热闹。一群孩子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棵碗口粗的枯树,连拉带拽地进了村,冬天干燥的土路,被枯树的干枝割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划痕,经北风一吹,扬起一团团黄土。村里的路本都不宽,黄土立刻蒙住了晒太阳的老人们的眼,只听到一群孩子从身边经过的嬉闹声,也听到一个男孩子不停地大声喊:“小伙伴们,我们马上就到家了,再坚持一会儿,今天晚上一定会很暖和!”黄土团也从村东一直飘到村西。寒冷的冬天,晒干的庄稼杆是生火取暖的主要来源,如果能寻到枯树枝干就更好了。原来,这群孩子不惜力气地从邻村拉来一棵枯树,就为了每家每户都能有一份枯树柴火。

为了把枯树柴火尽快送到各家,舅爷不听爷爷的话,学着父亲的样子,也拿起斧头劈砍枯树。农家工具没有儿童专用的,斧头都是很沉的那种,虽然爷爷一再拦着不让他动,可他就是不听,结果不幸终于发生了:一斧子下去,他是劈在了枯树上,也劈在了还扶在树上没及时躲开的左手食指上。只听得一声通天惊叫“啊”,空气瞬间凝结,只见他的左手血柱喷涌,食指最上一截骨肉已经断裂,只有一点外皮连接着……舅爷的父亲当场晕倒,他的爷爷一把攥住受伤的食指,喊人快去叫村医。可村医来了也没有好办法,转天又从县城请来了大夫,说千万不能感染,否则连小命都难保。爷爷就这样一直攥着那根手指三天三夜,姿势都没有变过。

全村人都为这个热心的孩子祈祷。那年冬天,村子里比往年安静了许多,晒太阳的老人每日都在关心孩子手指的情况,好像人们的真诚感动了上天,舅爷没有发生大夫所说的高烧、菌血症、败血症,他的命保住了。三个月后,也就是转年春节,他的手指不再感觉到疼痛,爷爷才敢拆下厚厚的纱布,那食指真的长上了,也有知觉。但是最上面那节食指不能弯曲,与下面食指对接明显错位,而且比其他手指粗了很多。从此,大家都管那根手指叫“笨手指”,那年舅爷只有六岁。

那是1937年,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日本侵华,抗日战争进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悲壮阶段。当时,日本鬼子已陆续侵入村庄,各村便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联系,迅速组织抗日队伍,与日本鬼子打起了游击战。每家每户都在挖地道,大灶台、火炕下、柴火房,都有地道进出口,而且户户相连、院院相通,最大限度地发挥游击战的作用。日本鬼子为了宣传大日本帝国精神,把学堂搬进了村子,要求孩子们都得上他们办的学堂,日本兵会端着刺刀不定期地到各家进行搜查,看是否有地下党的学习材料。

舅爷家的私塾先生早就不能授课了,舅爷带着一帮小伙伴,每日往返到姥姥家的王家村,跟着地下党组织学习新思想、新文化。回来后,他都立即把书用布包裹好,不固定地藏在树洞或埋在地下,以防被日本鬼子搜查到。日积月累的学习,使孩子们更加坚定了必须团结一心、一定要打跑日本鬼子的决心。舅爷最早一批参加了抗日儿童团组织,与大人们一起积极参与抗日,他把看到、听到的日本鬼子残害中国百姓的事实,及时讲述给母亲、婶婶们及小伙伴。他还经常把小伙伴们召集在一起,给大家介绍各村抗日的进展情况,将自己学到的新思想、新文化讲给大家听。他告诉小伙伴:一定要保护好地下党的叔叔们,他们是我们的亲人,能给我们带来希望。

抗日儿童团的任务很多,除了宣传新思想、新文化,还负责站岗放哨送书信,参与侦察敌情、抓汉奸,帮助抗日家属做事情。站岗放哨一般两个人一组,分组轮流值勤,团员们手持红缨枪或木棒,警惕地守望在村边、路口,遇到过往行人就进行盘查,查出可疑又找不到证明人的便带到村公所。团员们还在村外的山头上放哨,栽上“消息树”,派专人守在树下,发现日本鬼子出动,便将“消息树”拉歪,歪斜的角度越大,说明日本鬼子越逼近,树尖指向哪里,表明鬼子就来自哪个方向,村民就可以跑向相反方向躲藏。

一般重要的送信、传递消息、深入敌后的任务,都由通过专门培训且经验丰富、年长的儿童团团员来完成,但在一次紧急任务时,因专门传递消息的团员不慎摔伤,临时培训又来不及,村里决定再选派一人。在挑选的过程中,一听说是到有日本鬼子驻扎的村子去送信,有的孩子就害怕了,这时,舅爷主动站出来说:“我能去!”因为他年龄小,个子也不高,大家一时有些犹豫,舅爷胸有成竹地跟大家说了他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。于是,那次的任务就交给他去完成。

当舅爷进入五里地外的孟村时,真的有日本兵把守,原因是有人通风报信,告诉日本人这个村里藏有地下组织,所以入村的每个把口都有日本兵,凡进出村的人都会被搜查、盘问。鬼子兵背着带刺刀的长枪,双手在人们身上摸个遍,经过仔细盘问后再放行。稍有疑点,就会被拉到一边,那结果可就不好说了,看那阵势,别说是孩子,就是大人见了都觉得恐怖。舅爷是个蹦蹦跳跳七八岁的孩子,也没个大人带着,日本鬼子带着狗腿子一个劲儿地盘问,可是舅爷对答如流,而且身上也没搜着什么东西,不得不让他进了村子。进村后,舅爷凭着那根“笨手指”作为记号,找到了联系人;他把刻在脑子里的传递信息,一字不落地转述给了对方,因为传递及时,那次险些被日本鬼子抓到的地下党组织成员成功脱险了。那年舅爷九岁,他成了儿童团的名人,那根“笨手指”让他感到了自豪。

舅爷成了儿童团组织的重要一员,他号召村子里的孩子加入儿童团组织,带领大家一边读书学习,一边参加抗日活动。团员们互相学习并传授经验,他们利用年纪小、不被注意等特点,为八路军传递重要情报。儿童团还积极参与做动员、藏粮食、抬担架、帮助麦收、掩护伤病员等工作,舅爷成了真正的儿童干部。后来,因年龄小、体质弱,十几岁的舅爷生了一场大病,曾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,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,他才与曾一起参加儿童团的团员们联系上。

舅爷的一生,是默默无闻奉献的一生,直至离休。当地人只知道村里曾有一个特别有名的“笨指”大爷,做过艰苦的抗日工作,但具体姓什么、叫什么,谁也说不太清楚,但“笨手指”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太阳,是真正的母亲

——吴开晋先生和他的诗

刘功业

“长满羽毛的暖风/听到了太阳捎来的信息。”这是吴开晋1987年春,写在《长满羽毛的暖风》中充满生活气息的温暖诗句。太阳、光明,自古至今,都神秘而超能,具有驱除黑暗、激发生机的无限神力,永远是理想主义的浪漫诗人们愿意为之奉献激情的主题。

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吴开晋(1934.11—2019.12)先生,是我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时,主讲现当代诗歌课程的老师。

1977年那个冬天,带来久盼的温暖。恢复高考,使我们这些散落在命运沙漠的青年焕发了生机。知识就是力量,用知识改变命运,成为划时代的呼喊和青年一代成长的动力。这也成为吴开晋先生离开他学习、工作20年的吉林大学,来到山东大学任教的契机。“我把带着苦味的柳枝含在嘴里/数着一行大雁向北归”。(《柳笛》)“太阳即将起身/它拨开云雾的纱幔/洒出万点欣喜”。(《黄山印象》)

我的母校山东大学,有着深厚的诗歌传统。闻一多、王统照、臧克家、高兰等著名诗人,都在现当代文学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,也是我们一代代莘莘学子仰慕和追随的榜样。这样的文学长河中,吴开晋的现当代诗歌课,给我们这些饥渴已久的学生提供了新鲜的营养。慢慢熟悉后,我才知道,他早就是一位享有声名的诗人,参加过抗美援朝,写出过获得世界诗人大会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感人诗篇《土地的记忆》。

大学四年,因为对诗歌的偏爱,我和吴开晋老师勤有走动,获益良多。吴老师一边给我们上课,一边创作。他的诗,语言质朴,想象力丰富,以饱满的热情亲近自然,赞美阳光和理想,充满思想的力量。他注重审美,善于用意象和象征手法歌咏自然,倾诉心声,带着感情的温度,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。他强调,诗歌要写自然,更要写心灵。这也让他和青年学子们能够跨越代际,心灵相通,以诗为媒,彼此亲近。

教学和创作之余,他和高兰先生还担任山东大学学生社团“云帆诗社”的指导老师和顾问,帮助审阅稿件,一起探讨诗歌创作,与喜欢写作的同学们相交甚笃。在功课之余,我们刻蜡版、印诗刊、谈创作,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光。那些岁月,师生更像文友、挚友。

难忘1980年的那个秋天,更像冬天。我们云帆诗社在文史楼前布置的板报栏,被寒风撕碎,成为许多同学惨痛的记忆,甚至影响到毕业分配。吴开晋老师也因此受到牵连,但他一如既往地支持、爱护我们,传递着文学的温暖和力量。记得在一次和吴老师长谈之后,我写了一首题为《两代人》的小诗,毕业前发表在校刊上。全诗不过三节六句:“我说:从你的白发中/看到了生活和事业的艰辛//你说:从你的论文中/看到了当年的敏锐和青春//我说:但愿根根白发都能结出果实/你说:但愿岁月不能把锐气消泯。”我写的毕业论文《诗歌意境中的情与理》,也发表在山东大学的《稚虬》杂志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和吴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,多次参加吴老师在母校、北京、天津等地组织的活动。如1985年应邀回母校参加臧克家诞辰80周年纪念研讨会、参加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、参加山东大学《明湖诗词》活动、参加百年校庆诗友聚会,等等。吴老师和山大的老友侯龙飞、山师大的袁忠岳、吕家乡、宋遂良等教授,也都交谊深厚,我也因此与他们多次相聚,当面受教。我还多次参加吴老师主编的《现当代诗歌名篇赏析》《中国戏剧名著赏析》等几套丛书的编写和撰稿。历届校友同学中喜欢写诗的同学,也常以吴老师为中心,一有机会便得缘欢聚。吴老师平易、谦和、热情,奖掖后学,桃李天下。

1994年,吴开晋老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《月牙泉》。这年,他60岁。诗集收入他的146首诗。写于1984年的作为诗集题名诗的《月牙泉》,似乎能代表他这个时期的思考:“尽管风沙吞噬过无数春色/你明亮的眼睛却把春天带给沙漠/因为你怀里紧抱着地下的泉涌/你永远像一弯新月在高原闪烁。”他写《壶口瀑布》,“在我心中/装进你奔腾的万马”。浪漫的情怀,神奇的想象,增强了诗的感染力,更注重诗的质感和美感。

2011年春天,吴老师抱病为我的诗集《错位》,写了题为《诗路的跋涉和诗意的升华》几千字的序言,对我的创作进行评点,多有鼓励,也有一针见血的批评。《错位》“其最突出之处,是作者在强烈的生命意识观照下,去创造诗艺诗美,从而在诗歌艺术上有了更高的升华”,“作者的诗歌语言,似乎在追求一种真纯和朴实,善于把深刻隽永的诗意,建造在妇孺百姓都能通晓的语言形式上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深入浅出的功力。这种自觉的艺术追求和定位,应该说同样是积极的,正确的,是有意味的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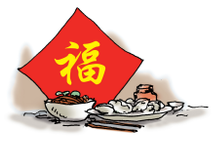
吴老师陆续出版过很多专著,如《现代诗歌名篇赏析》《新时期诗潮论》《现代诗歌艺术欣赏》《吴开晋诗文选》等,都很有影响。即使退休之后,吴老师仍然和各地的同学、诗友保持联系。吴老师后来在济南和北京两地居住,我也常去吴老师家里拜望,每次交谈都有获益。吴老师在同学们心中,是恩师,是学者,是诗人,更像亲密无间的挚友、无话不谈的亲人。

晚年的吴开晋老师,创作不辍。他写在2011年初冬的那一组《京华短吟》(八首),语言更加纯粹、灵动,如时光湖边一位终生沉湎于诗神化境的老人的睿智灵光。其中短短四行的《怀柔响水湖》一诗,“一万只金瓶在敲/声声涂染了过路的云/也敲响了银盘/降下阵阵光雨”。这是自然之诗,更是心灵之诗。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心灵对光的追寻和偏爱。太阳,养育了大地万物,也养育了诗人的灼灼之心。

这种对大地和阳光的眷恋与赞美,对自然和生命的感悟与升华,总是那么的美好,意象丰富,感情饱满。正是这种种诗意的美,构成了我们涓涓不息、生机蓬勃的文学传统,也让我们的诗歌充满着希望,传递着理想。驾鹤远行的吴开晋先生,身后依然是蓬勃的阳光:“也许,它还要变成种子/再生长出一枚枚温热的歌声。”

年夜饭上的故事

刘明礼



在我的印象中,年的况味除了团聚,还有憧憬和回忆。年夜饭的餐桌上,父亲常常触景生情,总免不了叨叨起一些陈年老事,似乎是在给我们上一堂忆苦思甜的传统教育课。

除夕晚上,随着三杯小酒就着饺子下肚,平时颇有些严厉,甚至不苟言笑的父亲,就会变得一脸随和,蹙着的眉头舒展开来,眼眯成了一道缝儿。我对他的疏远和畏惧也随之消散,胆子不由得壮起来。我往父亲身边凑凑,一脸好奇地问:“爹,你们小时候是怎么过年的?也吃饺子、穿新衣裳吗?”

爹放下手里的筷子,用迷离的眼神望着眼前的煤油灯,打开了话匣子……

父亲1931年生人,生下来十几天就没了娘,三岁那年又没了爹。他和两个哥哥跟着爷爷艰难度日。爷爷给地主家扛长活,一年到头挣不了几斗高粱。小哥仨只能外出讨饭,吃的是百家饭,穿的是百家衣。

爹说,他过年的时候,戴的是“芦花冠”,穿的是“喷地虎”,吃的是“到口酥”。见我一脸懵懂,爹摸摸我的头解释说:头上戴的帽子破得露出棉花套子,所以叫“芦花冠”;脚上穿的鞋子前露脚趾头、后露脚后跟,一走路“噗噗”地直喷地上的土,所以叫“喷地虎”;嘴里吃的是糠团子,一到嘴里就酥了,所以叫“到口酥”,这名字都是他自己起的。

我说那多冷啊,糠团子好吃吗?爹说,怎么能不冷啊,怎么会好吃呢?糠吃多了拉不下屎来,只能用手抠。

我又问爹,那您能吃饱吗?爹嗫一口酒,脸上掠过一丝幸福的表情:记得吃饱过两回。有一年大年三十儿,他们小哥仨外出要饭,到了五里地外的南答村,来到一户人家,端着破碗叫着:“可怜可怜我们,给口吃的吧……”

主人一看这大年三十儿还有出来要饭的,而且是小哥仨,家里一定是穷得揭不开锅,于是心生怜悯,问是哪村的?大伯说是小王村。主人又问你爹叫什么?当大伯说出我爷爷的名字后,主人一把抱起了我父亲,当即泣不成声:“孩子们,快进屋去,这是你们亲舅舅家啊!”父亲用手背抹了一把潮湿的双眼,说这是他终于吃饱了的一回。

还有一年除夕,小哥仨外出要饭,回来路上捡到了一只冻死的野兔。回家后,老爷爷给他们炖了,还蒸了一锅玉米面干菜团子。爹说,这是他记忆中第一次吃肉,真香啊!老爷爷禁不住老泪纵横、顿时失声:“孩子们,吃吧,敞开儿吃吧!”说到此处,父亲的两行热泪流到了嘴角……

这样的故事,在年夜饭的餐桌上,父亲不知给我们讲过多少遍。伴随着父亲对年的抚忆,我们全家告别了煤油灯,告别了土坯房,告别了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肉馅饺子的日子。

理发迎新

陈青延

从小的时候起,每个新年来临,我们家里兄弟几人都会理发,以新的面孔迎接新年。

岁月红尘,世事变化,从未改变我们迎新的习俗。小的时候,每当新年到来之前,父母都会让被叫来村里游串的剃头挑子,给我们兄弟几个剃头,但当理发师傅拿着理发剪和剃头刀走向我们时,我们都会感到害怕,急得哇哇大哭。这时,理发师傅就像变戏法似的,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糖笼络我们。

理发的过程中,头发掉在我们的后颈窝里,痒痒的,导致我们一个劲儿地乱动,理发师傅就会温和地说:“孩子真乖,听话,莫乱动,小心剪子夹了头发,刀子割了肉。”理发师傅这样一说,我们更是吓得不敢动了,任凭理发师傅摆布。

每次理发的时候,我的头是最难剃的,说出来不怕人笑话,我的头天生长得丑,前额相当突出,后脑勺也相当突出,就是农村人所说的像一个“尿端子”样的脑壳。剃头师傅每次捉住我理发时,都要累出一身汗。不过,经过他的一番精心修理,恰到好处地能够掩盖我脑壳的丑相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年轻的时候我走出乡村,到城里打拼三十年,每逢新年放假回乡下老家,不仅乡音未改,而且理个发迎接新年的习惯仍没有改变。

我已年近六旬,每逢新年到来前夕,我还会像年轻人一样赶个时髦,进入美容美发店,请理发师精心理一个头、染一下发、美一次容,在镜子面前照一照,自己感到满意了,才走出美容美发店,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携妻带女,回到乡下老家与亲人团聚,快快乐乐地跨入新的一年。

少年时的新年愿望

蒋元顺

时光倒退六十年,我还是十一岁少年。那时每到腊月新年,我的愿望其实很简单:希望在矿山矿井工作的父亲,能给我买一双鞋子、一套新衣服,最好还有一个新书包。

那时,父亲在矿山工作,每月有二十多元的工资,妈妈、大姐、二哥在农村劳动,每到年底结算之时,要欠生产队三百多元钱,而我的书包早已破烂得分辨不出颜色,走在路上时,书本、铅笔、圆珠笔常常掉出来,被其他小朋友捡了去。

当年我的新年愿望不算奢望,也不是过高要求,因为我们每年的班级文艺活动,我都是台柱子,没有新衣新裤新鞋,演出的时候我就只能四处去借,那个时候大家都困难,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,让我十分为难,所以我决心靠自己的双手劳动,实现新年愿望。

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我在学校下课后就上山扯猪草、背回柴火,供家里煮饭。在劳动之后,为了实现新年愿望,我和特别要好的小朋友,一起去捡橘子皮、牙膏皮和废纸废报废书,然后在星期天拿到收购站去卖,可以换回几角钱的收入。但这些劳动收入,离我新年愿望的实现还十分遥远。

我们又背上小背篼,扛着拴了长竹竿的镰刀,到山上去打松果,背十多里山路去收购站卖。从星期天早上七点,到晚上五点天要黑时,可以打到二三十斤松果,挣到约一元五角钱。一个学期下来,就是七十多元钱啊。

记得有一天,外婆告诉我,今天是腊八节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我从自己枕头下面拿出攒下的钱,约上最要好的朋友,开开心心地到公社的街上,买了崭新的衣服、鞋子和书包,还给辛苦劳作的父亲买了一斤甘蔗皮酒,给大姐买了红头绳,给大哥买了一双袜子,给爷爷奶奶外婆外公买了两斤水果糖。

到了新年(农历年)的早晨我拿出这些礼物,亲人们很是高兴,脸上露出阳光照耀般的笑容,几位老人欢喜得直抹眼泪,夸赞新年礼物是我这个晚辈用劳动换来的。

从这以后,我不仅在学校努力学习,成绩排在前三名,放学下了课,只要有时间,我就约上小朋友一起去捡废品,星期天上山打松果,攒下钱实现新年愿望。

时光如梭,一晃六十年过去了。前几天,我的侄儿侄女笑呵呵地对我说,他们的新年愿望实现了:买了一辆私家车,交了商品房的首付,只等着三年后搬进新房。

听到这样的话,我十分想念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,他们先后离开了我们。我和大姐、二哥和弟弟妹妹,现在有了幸福的生活,完全有能力帮助老一辈亲人实现新年愿望,可惜他们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几十年前的新年愿望和现在的新年愿望比起来,让人感触最深的是,社会发生了过去不敢想的变化。但我依然难以忘怀曾经困难的日子,亲人们对待生活的坚韧与乐观……

那年腊月

瑜 琼

大舅的小孙子在动画片里看到小猪滑冰,缠着大舅嚷嚷着他也要滑冰。这不,一进腊月,大舅就在自家的院子里,泼了几桶水。数九寒冬,一夜过后,院子里就结起一层厚厚的冰。一身小羊羔般的大棉服,把小孙子裹得滚滚圆,头上毛茸茸的厚帽子还没戴正,他就挣脱了大舅紧攥着的手,球一样一骨碌滚到冰面上。这是有别于初春、仲夏、深秋的别样的开心与快乐,是属于寒冬腊月里的露天游戏。

我小时候,老家前院儿有半亩大园子,环绕着园子有一条沟和一个坑。沟里有水,水深至膝,坑中有鱼,水深近两米。盛夏,沟和坑的浅水处,芦苇青绿茂盛,而深秋,芦苇顶端生出芦花,苇茎变黄,待到地冻寒天,茸状的苇花落英般飞入深冬,缤纷了那个苍白的季节。

站在坡顶看芦花随风,总觉得还不够过瘾,刺眼的冰面白花花折射出诱人的光,冰面下自由的小鱼对孩童时的我们更具诱惑力。

母亲吓唬我们,不进腊月不许跑冰,因为只有到了“三九”天,冰层才能封冻结实,但再结实也不能到坑里跑,因为坑里水深,万一掉进去就上不来了。她只允许我们到浅沟里跑,沟里的水不及大人膝盖。

等到腊月初一晚上,锅里的炒玉米噼噼啪啪炸开了花时,属于孩童的冰雪世界,才真正降临。转天,大哥手提冰镩,大声道,谁想吃鱼,跟我走!一个招呼,我和弟弟们呼啦啦跑到前面开路,扒开沟面上摇曳的芦苇,镩尖杵到冰上,一不留神,飞起的冰碴溅进眼里,瘆凉瘆凉的。

几分钟后,足球般大的冰眼打好了,大哥把捞网伸进冰窟窿,顺时针360度快速转上几圈儿,提出来倒在冰面上,几条鲜活的小鱼、小虾跃起老高。“快捡,一会儿冻死了!”大哥吩咐完,又去杵另一个冰眼。我和弟弟们伸出通红的小手,兴奋地把鱼虾拾进竹片弯口的网里。等待期间,我们小心地绕开冰眼,像风车一样滑出去。

母亲做的细密的千层底棉鞋,在冰面上走起来稳,滑起来光。二弟和三弟不时摔趴下,小弟在后边笑得肩膀颤抖。

大哥杵了十几个冰眼,捞了近两斤的鱼虾,又打了一些芦苇当烧柴。中午,母亲把芦苇塞进灶里点燃,大铁锅烧热,在锅底擦了一点点猪油,把鱼倒进锅里两面一煎,再掰一块儿母亲自己做的黄酱稀释成水,大火烧旺,黄酱水浇到鱼上,盖锅烧开。贴饽饽时,几个孩子抢着烧火,灶膛里的火苗烤热了我们冻僵的手脸和胳膊腿儿,闻着锅里溢出的鱼香味,我们心里幸福又温暖。

母亲在灶膛里又做了一汆子开水,小鱼就饽饽吃饱了,喝上一碗热水暖暖胃。那是缺衣少吃的年代,是只见白菜缺肉少油的年代,能在隆冬腊月吃上鱼虾解馋,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放飞童趣,是多么激动而难忘的事儿。

那些年的腊月,大哥带队,我们当兵,一把镩子杵遍了村子周围的浅沟浅渠,每次或多或少都有收获。小弟提着盛鱼的网,或端着盛鱼的盆儿,飞似的往家跑,两里地外就能听到我们的大呼小叫。一家人围坐在炕上的小方桌前,外面再低的温度也不觉得冷,再大的风也不惧怕。把清水白菜的寒冷岁月,过得温馨蒸腾,快乐静好。但除了偶尔的鱼虾,食物的匮乏让我们依然盼望除夕那天的猪肉炖白菜……

腊月像个分水岭,一头连接贫乏,一头通向希望。一进腊月,孩子乐、大人愁。孩子们盼新年、盼新衣、盼美食,好像进了腊月,这些美好的东西离我们就不再遥远。

“好过的日子难过的年”。那些年,母亲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儿。进了腊月,年关临近,大人们开始翻箱倒柜,攒了又攒的鸡蛋钱花光了,卖青蒿干草的钱花光了,卖刀郎子的钱也花光了。母亲把家里盛钱的柜子翻个底儿朝上,除了鼓捣出几尺旧布片,再也拿不出一分钱。于是,母亲托人把旧布片染上颜色,勉强给三弟和小弟每人缝了一件“新衣”,再把大哥穿小的一件旧衣改了改,给了二弟。

那年,我的“新衣”是老姨穿小了的一件紫色嫁衣。作为家中的长子,母亲那年没给大哥做新衣。

文艺周刊
第二九〇七期

社址: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143号 邮政编码:300070 总编室:23602716 社会部:23602777 广告:81316697 发行热线:58106600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:津市场监管西广登【2021】1号 零售1元5角 印刷单位:天津北方报业印务公司(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十支路8号)